



# 蒙古帝国时代西方对中国的认识

张西平

当1206年铁木真被蒙古王公大会推为成吉思汗后，在欧亚大陆之间，一个马背上的草原帝国迅速崛起。随着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的正式建立，中国和西方的交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畅通阶段。中国和欧洲之间所横亘的无际的沙漠和绵延的群山再也挡不住响着驼铃的商队，驿站的建立更是为中西交通提供了稳定的条件。“正是在蒙古时代，中国才第一次真正为欧洲所了解。”

## 柏郎嘉宾的《蒙古史》 (L'Yatoria Mongslorum)

约翰·柏郎嘉宾(Jean Plano Carpin)，意大利的神甫。在蒙古的铁骑横扫东欧以后，1245年他奉英诺森(Innocent)教宗之命出使蒙古，试图了解蒙古的军事动向，修复蒙古帝国和欧洲的关系，以消解笼罩在欧洲人心中的对蒙古人的恐惧与惊慌。经过长途跋涉，身体略胖且年事已高的柏郎嘉宾奇迹般地到达了蒙古帝国的心脏哈刺和林(Karakorum)，并参加了

贵由(Güyük)大汗的登基典礼，在递交了教宗的书信后，于1247年返回法国的里昂。

柏郎嘉宾返回欧洲后所写的《蒙古史》是当时欧洲第一部关于蒙古人的著作，他在对东方和中国介绍的“可靠性和明确程度方面，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是首屈一指和无可媲美的”。这本书之所以被给予如此高的评价，主要在以下两点：

第一，实地考察，材料翔实。柏郎嘉宾在蒙古帝国生活了三年多，书中的记载绝大多数是他亲眼所见，即便是一些有关蒙古和中国的历史情况，也都是那些多年生活在蒙古的西方人告诉他的，如乌克兰人、法兰西人等，可信度很大。《蒙古史》的这一特点，使它和以往西方的那种口头相传的游记有了根本性的区别。

第二，态度公允，评价客观。虽然柏郎嘉宾是一位方济格会的传教士，但他在这本书中“并没有以一位传教士的精神面貌来介绍蒙古人”，他也“没有为读者们提供一些过分臃肿的教

理评论,对当地民族的瑕疵和美德,他都做了客观的评价。但对于他们社会道德准则的评价则是审慎和颇有分寸的”。

柏郎嘉宾在书中对蒙古人的生活环境、地理条件,人们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这个可怕的草原帝国的政治结构和军事组织,以及向周边扩张的历史和过程都做了详细的介绍。他向欧洲展示了一幅真实的东方画卷。

“鞑靼人双目之间和颧颊之间的距离要比其他民族宽阔。另外,与面颊相比,颧骨格外突出,鼻子扁而小,眼睛也很小,眼脸上翻一直与眉毛联结。一般来说,他们身材渺小,只有个别例外,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中等身材。”这是对普通蒙古人的介绍。在谈到蒙古大汗贵由时,他写道:“这位皇帝大约有四十至四十五岁,或者更年长一些;中等身材,聪明过人,遇事善于深思熟虑,习惯上举止严肃矜重。任何人没有见过他放肆地狂笑或者凭一时的心血来潮而轻举妄动……”

但这本书绝不是那种走马观花式的游记,它在西方的东方学上所以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于他对蒙古帝国的历史和现状作了前所未有的介绍。对今天的中国学术界来说,这本书也绝不仅仅是个文学的读本,他对蒙古民族当时情况的介绍大大丰富了对元蒙帝国史的

了解,在许多方面弥补了当时中文文献的不足。

例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史学家都认为,在唐武宗灭佛以后,景教也受到牵连,以后便逐渐灭亡了。但书中对蒙古帝国当时的景教徒的活动做了详细的介绍,这些就纠正了我们过去的认识。景教在整个蒙古帝国都有着特殊的地位,无论是在忽必烈统治的中国,还是旭烈兀统治的波斯地区,基督教的信仰渗透到了蒙古社会的上层,景教徒受到了特殊的礼遇。实际上由于“克烈部和乃蛮部(在文化上和政治上他们同蒙古人有最密切的联系)主要信奉基督教”,而蒙古的贵族同克烈部王族通婚,这样“大汗们的妻子和母亲中,有许多基督教徒,包括他



忽必烈像

们之中某些最有影响的人物在内，如蒙哥，忽必烈，旭烈兀的母亲……”直到今天为止，我们在编写中国基督教史时，柏郎嘉宾这本书仍是我们不可或缺的基本文献。

在柏郎嘉宾时代，欧洲人还没有中国的概念，那时他们所知道的“契丹”实际上就是今天的中国。从“契丹”到“中国”，他们大约花费了近四百年的时间，这点我们以后还要讲到。在这本书中有两处较为详细地讲到“契丹”。

在书的第五章介绍蒙古帝国兴起的历史时，他说，成吉思汗召集自己所有的军队，向契丹发动了再次进攻。“在经过长期浴血奋战之后，他在该国的一部分领土上取得了胜利，甚至还将契丹的皇帝围困于京师，围攻了许久……他们攻破了城门，进入城内，皇帝和大批居民惨遭杀戮，他们夺城之后又将城内的金银财宝洗劫一空……于是，契丹的强大皇帝被击败了，这时成吉思汗便被拥立为帝。”这实际上是指蒙古军队与当时中国北方的金朝的战争。女真人的金政权建于1115年，到1234年时完全被蒙古人所摧毁，期间蒙古人于1215年夺取了北京，女真人放弃北京逃到开封以后，1233年亦被攻破，金朝皇帝落荒而逃，最后自杀而亡。

柏郎嘉宾还对契丹人的文化和精神生活做了报道，他说：“契丹人都是异教徒，他们拥有自己特殊的字母，似乎也有《新约》和《旧约》，同时也有神徒传、隐修士和修建得如同教堂一般的房舍，他们经常在其中进行祈

祷……他们表现为通融之士和近乎人情。他们不长胡须，面庞形状非常容易使人联想到蒙古人的形象，但却没有后者那样宽阔。他们所操的语言也甚为独特。世界上人们所习惯从事的各行各业中再也找不到比他们更为娴熟的精工良匠了。他们的国土盛产小麦、果酒、黄金、丝绸和人类的本性所需要的一切。”

法国汉学家韩百诗（Louis Hambis）认为：“柏郎嘉宾对契丹人所做的描述在欧洲人中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同样，他也是第一位介绍中国语言和文献的人，但由于其中所涉及的都是寺庙和僧侣，所以他所指的很可能是汉文佛经。对其他情况相当含糊不清，唯有对汉人性格和体形的描述除外。”

### 《鲁布鲁克东行记》(The Journey of William of Rubruk to the Eastern Parts)

柏郎嘉宾的报告在西方教会内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道森所说：“对西方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比普兰诺·加宾尼（即柏郎嘉宾——作者注）的报告更为惊人，比贵由给教皇的信更使人感到威胁了。”这样，英诺森四世又分别派出了阿塞林（Ascelin）、龙汝模（André de Longjumeau）、贵加禄（Guichard da Cremona）三位多明我修士前往蒙古军队的营地，这个代表团也得到一个大汗给教宗的回信。阿塞林等人返回欧洲后并未留下任何文献。在此期间，蒙古帝国和教廷之间互有来往，阿塞林返回西方时有蒙古帝

国的特使薛尔吉思等二人同行，并于1248年在意大利受到教宗的接见。1248年，法国的路易九世也接见了蒙古帝国的使者景教徒大卫(Moriffat David)和马尔谷(Marcus)，第二年法国又派安德鲁出使蒙古。

但在柏郎嘉宾后最有影响的是鲁布鲁克(Guillanne de Rubruquis)。此君是法国人，也是方济格会的修士。他受法王路易九世的委托，带着法王致蒙古大汗的信，于1253年5月7日从康士坦丁堡出发，途经拔都的属地，最后到达汗廷，见到了蒙古大汗蒙哥，后于1255年8月15日返回巴黎。

鲁布鲁克的书无论在向西方世界介绍蒙古人方面，还是在介绍契丹人方面都比柏郎嘉宾的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前者来说，柏郎嘉宾仅仅参加了贵由的登基典礼，和大汗的实际接触并不多。而鲁布鲁克在蒙哥大汗身边生活近一年，有更多的接触机会，对蒙古帝国的内部情况介绍得就更为细致和深入。例如，他说，蒙哥有一个妃子叫昔林纳，她信仰基督教，还为蒙哥生了一个孩子。蒙哥曾陪同她一起到教堂做礼拜。蒙哥的长子有两个妻子，他本人也对基督教很尊敬。蒙哥的第二个妻子叫阔台，她生病后传教士曾给她治过病。甚至在他的游记中还说蒙古大汗贵由是被拔都所害死的，中国学者何高济认为，这个记载是关于贵由死因的唯一材料。

从后者来说，他对契丹的介绍有两点大的进步：

第一，他明确指出“契丹”就是西

方在古代所讲的“丝国”。他说：“还有大契丹，我认为其民族就是古代的丝人。他们生产最好的丝绸（该民族把它称为丝），而他们是从他们的一座城市得到丝人之名。”鲁布鲁克的这个发现对西方的文化历史记忆来说很重要，正像学者们所指出的，鲁布鲁克的贡献在于“在欧洲人中，他第一个很准确地推测出古代地理学上所称的‘塞里斯国’和‘中国人’之间的关系，即一个国家和它的人民”，“他把西方一度中断的中国形象的传统又承继上了”。契丹和当年的丝国是一样的富足，所以“城墙是银子筑成，城楼是金子”。

第二，鲁布鲁克所介绍的契丹也并不全是猜想，在实际知识的认识上还是比柏郎嘉宾多了些内容。

他说：“该国土内有许多省，大部分还没有臣服于蒙古人，他们和印度之间隔着海洋。这些契丹人身材矮小，他们说话中发强鼻音，而且和所有东方人一样，长着小眼睛。他们是各种工艺的能工巧匠，他们的医师很熟悉草药的性能，熟练地按脉诊断；他们不用利尿剂，也不知道检查小便。”这介绍了中国的方位、人种和医学，特别是对医学的介绍在西方是第一次。

更为吃惊的是他介绍了中国的佛教、印刷和绘画，在此以前从未有人向西方介绍过这些内容。他说：“上述诸族的拜偶像的和尚，都穿红色宽僧袍。据我所知，他们那里还有一些隐士，住在森林和山里。他们生活清苦，使人赞叹。”契丹“通行的钱是一种棉纸，长宽为一巴掌，上面印有几行字，像蒙哥

印玺上的样子。他们使用毛刷写字,像画师用毛刷绘画。他们把几个字写成一个字形,构成一个完整的词”。

实际上他并未真正到过中国,但当时有很多中国北方人在哈刺和林居住,这些知识很可能是他从在当地生活的中国人那里得来的。

真正到过中国的是马可·波罗和孟高维诺,从时间上来说,《马可·波罗游记》是1299年发表,要早于孟高维诺的书信,但考虑到《马可·波罗游记》实际上是整个西方游记汉学的集大成者,所以我们放在以后做专门的论述,这里我们将西方中世纪时鲁布鲁克以后其他有关中国的书籍集中加以讨论。

#### 《海屯行记》及孟高维诺等传教士书简

海屯(Hethun,或作Hayton)是小亚美尼亚的国王,当时他看到蒙古人的铁骑不可阻挡,感到与其被灭不如议和。于是长途跋涉,在1254年初出发,当年9月到达大汗营帐,呈献礼品,甘愿做大汗的附臣。大汗大喜,以礼相待,1255年返回他的祖国亚美尼亚。《海屯行记》是他一路的见闻。

孟高维诺(J.de Monte Corvino, 1247~1328),意大利人,方济格会传教士,公元1289年,他携带着教宗尼古拉四世(Nicolas IV)致元世祖的信出发,1294年到达元大都。在北京期间他曾受到聂思脱里派教徒的迫害,但最终获得了皇帝的信任,在汗八里建起了天主教的教堂,并开始广收教徒,他实为天主教在中国的开创者。在中

国期间,他三次给欧洲写信,留下了有关元代中国的真实文献。

意大利人鄂多立克也是方济格会的传教士,他云游四方,1318年开始他的东方之游,经印度,渡南海,由广东入中国,从1322年至1328年,他在中国内地旅行达6年之久,晚年回国后在病床前口述下他的东方神奇之旅。其书广为流传,他被西方誉为中世纪四大旅游家之一。

马黎诺里,意大利人,也是方济格会会士,1338年奉教宗之命前来中国,同行者有30余人,1342年到达汗八里。元顺帝隆重欢迎,待为上宾。他代表教宗给元顺帝献马,一时朝中轰动,文人和大臣们写诗以赋之。《元诗选》中就有五首吟咏天马的诗篇。1346年经杭州、宁波,至泉州返回欧洲,1353年到达罗马。后撰写波希米亚史,内有在中国的游记。1820年被德国人译成德文出版。

蒙古帝国是人类史上唯一的将欧亚大陆连成一体帝国。从中国的东海之滨直到地中海的东岸,从中国的大都到伊斯兰的大马士革,从俄罗斯南部的平原到红海海口,一切道路都畅通无阻。海道安全,陆路平静,如史学家所说,当时人们就是头顶着一盘金子也能从大地的东方走到西方,一路安全。这是一个大旅行的时代。在蒙古帝国时期,从欧洲来到东方、来到中国的有几十人之多。他们的书信和游记像草原上的白云一样在中国和欧洲之间飘荡。欧洲人正是从这些游记和信简中,雾里看花,渐渐从朦胧中走向

现实。一个神奇遥远的中国时明时暗地呈现在他们的前面。

如果把这一时期的游记稍加归纳，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游记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介绍比较突出。

第一，对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有了更广泛的了解。

孟高维诺、鄂多立克等人在游记中分别介绍了多座中国的城市，其介绍范围之广是以前游记中所没有的。在谈到杭州时鄂多立克说：

我来到杭州城，这个名字意为“天堂之城”。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确实大到我简直不敢谈它，若不是我在威尼斯遇见很多曾到过那里的人。它四周足有百英里，其中无寸地不住满人。那里有很多客栈，每栈内设十或十二房屋。也有大郊区，其人口甚至比该城本身的还多……

他还谈到中国多彩的社会经济生活，说在广州有数不清的船舶，就是整个意大利的船加起来也没有广州多；在契丹有鸡、有鹅、有鸭，甚至鲜美的蛇肉，想吃什么有什么。男女的服饰，渔民的鱼鹰，寺庙里的动物，吐蕃（西藏）的天葬，蛮子国（中国南部）民间富人的生活，这一切都在他的关注之中，他为欧洲的读者勾画了一幅中国的全景图画。

孟高维诺感叹地说：“关于东方人的国土，特别是大汗的帝国，我可以断言，世界上没有比它更大的国家了。”“据我见闻所及，我相信在土地之广、人口之众、财富之巨等方面，世界上没

有一个国王或君主能与大汗陛下比拟。”

第二，对元朝的宫廷生活了解得较为深入。

蒙古大汗这个曾使整个欧洲闻风丧胆的人，当时在西方是个神秘的人物，汗八里这个大汗居住之地更是神秘莫测。这些传教士的游记则慢慢揭开了大汗和汗八里的神秘面纱。鄂多立克在介绍大都时说，它有十二个城门，两个城门之间的距离有两英里，整个城墙加起来超过四十英里。大都城有内外两层：

大汗及他的家人住在内层，他们极多，有许多子女、女婿、孙儿孙女以及众多的妻妾、参谋、书记和仆人，使四英里范围内的整个宫殿都住满了人。

大宫墙内，堆起一座小山，其上筑有另一宫殿，系全世界之最美者。此山遍植树，故此山名为绿山。山旁凿有一池（方圆超过一英里），上跨一极美之桥。池上有无数野鹅、鸭子和天鹅，使人惊叹。所以君王想游乐时无需离家。宫墙内还有布满各种野兽的丛林，因之他能随意行猎，而不需要离开该地。总之他居住的宫殿雄伟壮丽。

他还记载了大汗的出行、行猎等情况：

皇帝乘坐一辆两轮车，其中布置了一间极佳的寝室，均为沉香木和金制成，有大而精的兽皮覆盖，镶有很多珍宝。车子有四头驯养的和上笼头的大象拉曳，还

有四匹披戴华丽的骏马。四名诸王并行,他们叫怯薛,保护和守卫车辆,不让皇帝受到伤害……大汗要去狩猎时,其安排如下。离汗八里约二十天旅程之地,有一片美好的森林,四周为八日之程;其中有确实令人惊奇的大量形形色色的野兽。森林周围有为汗驻守的看管人,精心地给予照看;每三年或四年,他要带领人马到这片林子去。

最后,这些传教士的信简展现了一幅元代天主教史的真实历史画卷。孟高维诺认为大汗“对基督徒非常宽厚”;马黎诺里说,他到汗八里后,大汗对他们十分热情,他在大都还“和犹太人及其他各派宗教人士有过多次辩论,皆辩胜”。当时,在大都城内的天主教教堂的费用和传教士们的费用“皆有皇帝供给,十分丰富”。鄂多立克说他在“那座城市中住了整整三年;因为吾人小级僧侣在王宫中有指定的一席之地,同时我们始终必须尽责地前去为他祝福”。在皇宫中有基督徒、突厥人及偶像崇拜者。这充分说明了元代时在宗教信仰上的多元性和元朝的开放的宗教政策。

孟高维诺等人的信则真实地反映了元时景教和天主教之间的斗争。他说:

聂思脱里派教徒——他们自称为基督徒,但是他们的行为根本不像基督徒的样子——在这个地区的势力发展得如此强大,因此他们不允许奉行另一种宗教仪式的任

何基督教徒拥有任何举行礼拜的地方,即使是很小的礼拜堂;也不允许宣讲任何与他们不同的教义。由于从来没有任何使徒或使徒的门徒来过这些地方,因此上面提到的聂思脱里派教徒既直接地又用行贿的办法指示别人对我进行极为残酷的迫害,宣布说,我并不是被教宗陛下派来的,而是一个间谍、魔术师和骗子。

但是天主教仍在元代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孟高维诺说他已经为大约6000人受洗,北京已有了两座教堂;刺桐的安德鲁主教说那里也有一个很好的教堂,而且正在准备建新的教堂。此间他们最显赫的成就是将蒙古的一位王爷阔里吉思拉入了天主教:

这里有一位阔里吉思王,信仰聂思脱里派的基督教……我来到这的第一年,他就同我很亲近。我使他改信了真正的罗马天主教的正宗教义。他被授予较低的圣职。我在举行弥撒时,他穿着庄严的法衣前来参加,因此其他聂思脱里派教徒们责备他为背叛。然而,他劝导他的大部分人民皈依了真正的罗马天主教,并捐建了一座壮丽的教堂,供奉上帝、三位一体和教宗陛下,并且按照我的建议,赐名为“罗马教堂”。

这些方济格会修士们的记载已经被现代的学者研究所证实,元蒙时期是中国基督教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